

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

指严随笔

许国英著 张蜀编选、校点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指严随笔

许国英著 张镛 编选、校点

主 编 姜纬堂 李 乔

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指严随笔/许国英著;张镨编选、校点. —北京: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1998.3

(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/姜纬堂, 李乔主编)

ISBN 7-5035-1648-8

I. 指… II. ①许… ②张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近代-选集 IV. I2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9420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)

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.625

字数:195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前言

尽管“随笔”一词，迟至南宋·洪迈《容斋随笔》方才出现，并用为书名，但这种体裁却古已有之，先秦诸子著作中的许多篇章，其实就是后世所谓之“随笔”。非只此也，就连号为经典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，又何尝不是后世所谓的“随笔”？

为什么随笔一体如此源远流长，虽历数千年，迄为著述家与读者所钟爱？

说来，其因不外：

一是随笔之“散”。所谓“散”，系相对于历史上曾代兴之“韵文”（如楚辞、汉赋之类）、“骈文”（即所谓“四六文”）等而言。因其属于“散文”，故无固定之程式和法则，执笔者可享充分之自由，无所拘束，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，且其形式一般不为时代风尚所左右。

二是随笔之“随”。即主题不限，内容不拘，可庄、可谐、可大、可小，随所感、所闻、所见，皆得直抒胸臆，信笔书之，若话家常。不必有系统，更无须顾及全书之结构，即使是“东一榔头，西一棒锤”，亦不致见

讥于人，谓非著述之体。

三是随笔之“短”。凡号为随笔者，篇幅皆有限，一般均以简明扼要取胜，即便阅读，又利于内容之浓缩。以同等篇幅论，则“随笔”读来省时，且所包含之信息量相对为大，为丰，使读者得事半功倍之效，获开卷有益之实惠。

四是随笔之“松”。随笔所含，较少庄严凝重之内容，其题材多相对轻松活泼，或属人生之体味，或属故典之探究，或属社会之新闻，或属闻人之逸事，或属谈诗论文，或属研艺述珍……总之，一般多具趣味，分别以哲理性、知识性，予读者以多层面之启发，既有裨见闻，亦足资谈助。无艰于阅读之劳苦，有品味高尚之收获。犹之轻音乐之可令人愉悦、放松，享消闲遣兴之乐。

这散、随、短、松四字，既为随笔之长，相对亦为其短。散，或致缺乏义蕴、文采；随，或流为冗琐丛脞；短，或易偏面难全；松，或失诸肤浅庸俗。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。惟在执笔者之善于驾驭。名家与恶道、杰出与庸俗，亦由面别之。实例具在，不必深论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：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，和世代著述家的努力，“随笔”这块园地已是流派纷呈，争奇斗妍。

有的侧重于议论感悟，有的侧重于掌故珍闻，有的侧重于谈文论艺，有的侧重于搜奇列异，有的侧重于抒发感情，有的侧重于研究学术，有的侧重于描绘故事，有的兼而有之……此系就内容而言。至于在写法上，或

致力于艺术渲染，或致力于本色写实，或致力于单线白描，或致力于浓墨重采，或综而合之……亦各有独到。

这种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形成，既基于著者之学养与情趣，更决于著者的造诣与功力。“孙猴、八戒，各有所爱”，读者尽可自择所尚，初不必有所轩轻。

说到这里，有必要解释一下“笔记”与“随笔”。脱开现代文艺学的范畴，就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，人们习称之“笔记”，当然属于“随笔”，但却不能等同于“随笔”。

盖“随笔”，即洪迈所谓“意之所之，随即记录，因其后先，无复詮次”者也，故其范围更宽，更广，除习称之“笔记”外，诸凡非专著性，而系零篇短什之野史、稗乘、书事、纪闻、传人、述感、序跋、题识、游记、日记、语录、书札等等，皆可归之于“随笔”。

本丛书之取名“随笔”，意在示其包罗对象不仅仅限于习称之“笔记”。

同理，本丛书所谓之“近世”，亦不尽同于习用作历史分期之“近代”。

今中国历史，以鸦片战争至“五四运动”为“近代”，“五四运动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“现代”；世界历史之分期，则非但说法各异，且无一与中国历史分期吻合者。本丛书仅取其相通者为参照，而用“近世”一词之古义，即《荀子·非相》篇所谓“远举则病繆，近世则病佣”的“近世”，意谓去今不远之时世。

具体说，系指自清中叶即鸦片战争前数十年（十九世纪初），以迄 1949 年。如此划分的目的有二：一是想把鸦片战争前的社会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背景包括进来；二是由于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，中国的社会性质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。

持此为范围，凡生活于其间之文史随笔作家，纪述其间事实之文史随笔作品，皆在搜罗与发掘之列。当然，其中之记述内容多有上及清初，甚或更早者，但须以记上述“近世”者为主；其中作家之生活年代，或有其生早于十九世纪初，或有其卒已为建国之后者，但其主要文史随笔著作的产生及其成名，则应系上述“近世”之事。

至于本丛书之于“随笔”前特冠“文史”二字，是想稍稍限定范围，即将专门属于美文、专门抒发情感、专门探讨哲理、专门从事议论、专门搜奇列异、专门研治“经学”的一些“随笔”除外，力避虚空、繁琐和过于艰深。

所收罗者，侧重习指之“文史”，即文化与历史，以掌故性、知识性和启发性，使读者于可读耐赏、广知博闻、明目醒脾之余，对近世文史随笔作家及其著作有所认识与了解，聊充深入探究之津逮。

丛书名称中之“选粹”二字，既体现了编辑的宗旨，也标明了编辑的方法。

“选粹”者，择其精华也，撷其纲要也，提供读者

以经过挑剔、加工之精神食粮也。近世文史随笔著作虽然相当丰富，但内容亦颇驳杂、参差。本丛书既定位于一般文史爱好者和有兴趣于广知博闻，汲取有益之精神营养的读者，而非专门研究者，自然不必无别优劣，不分精华与糟粕地全文照印，徒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和本可他用的纸墨。因而，“选粹”便成为必要。

且惟有“选粹”，方符“批判地继承”旧时精神产品的正确方针；惟有“选粹”才能更好地实现“便于读者认识近世历史文化社会，了解民族优秀文化遗产，鉴往励今，推进两个文明建设”的编辑宗旨。

选粹，包含了两层含义：一是在众多作家中“选粹”，一是在该家众多作品中“选粹”。也就是把优秀作家和他的优秀作品发掘出来，经过加工，贡献于读者。虽系尝鼎一脔，但足可由而略窥全盘。

其间，在每辑所收八家中，适当注意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、不同时期作家的搭配，以免单调。由于限定每位作家一册，故其随笔著作之总篇幅未超过二十万字，致无“选粹”余地者，则只好割爱。

具体操作中，则根据诸家作品的实际，以“四性”、“六不取”为原则。

四性，谓知识性、趣味性、科学性、史料性。

六不取为：过于深奥，为今日一般读者所隔膜者，不取；攻击、污蔑、歪曲农民起义者，不取；丑化、歧视兄弟民族者，不取；宣扬宗教、迷信者，不取；低级

趣味或格调不高者，不取；与时代潮流、现行政令抵触（如宣扬早婚、纳妾、多子多福、嘲诋火葬之类）者，不取。

需加说明的是“六不取”所指为内容主旨，非指个别词句。若称农民起义为“匪”、“逆”之类，不必因有此类词句而概弃之，相信读者自会鉴别。余可类推。

至于因时代与阶级地位限制，在观察的准确，立论的允当，记述的严谨方面，原文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，自然未可苛求，于此不必细说。

由于近世文史随笔著作，多采用比较浅显的近世文言文，用繁体字，或无标点，或仅有断句，且在称谓习惯、书写格式等方面，亦与今不尽相同，不便今日一般读者阅读，加之所据底本，难免抄印之讹误，所以必作相应之加工。但这加工，非谓修改或删除原文，而系在保存原文的基础上进行。

具体包括十二项：

一、校订文字，对原本抄写、刊印之讹误，在理由充分、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采取径改法，不另说明；对属于疑似之间，无确切把握者，则姑仍其旧，不擅为更动。原文中以□□□隐去其名者，一律仍旧。个别无从辨识之字，亦以墨框示之。

二、改为简化字，统一异体字，加现行标点符号，横排。

三、凡于兄弟民族名称加“犬”旁之类，意存污辱者，统回改为该兄弟民族之本称。

四、除原无条目标题者，概为新拟条目外，原有者亦视情况，或保留，或重拟，并于导言中说明。

五、对行文中使用字、号、别署，以及以谥为称、以籍为称、以爵为称、以官为称者，统于新拟标题中列出该人之姓名。

六、对因未取其前之具名条，而所选条又中脱姓、脱名、脱年号、脱地名者，一律补于文中之相关部位，并附〔 〕以别之。

七、原文中之小字夹注，则改为同号楷体字，加（ ）以别之。个别或仅以不同字体区别之。

八、原文过长者，酌为分段。或撷取其中有关部分，单独立条。惟均保持原文完整，中不删节。

九、每册依内容性质，或依来源，分为若干类，并拟类目；类下之条文，依符合逻辑之原则排列，不尽依原书。

十、每条末，注明来源、出处，以便复按。个别或取统一说明法，不一一具列。

十一、书首统加以《×××（该书著者）和他的随笔》为题之导读专文，介绍著者及其随笔，说明选编中之有关事项。

十二、书末统附有关该著者的碑传资料，及其随笔著作的叙录资料。

如此加工的目的只有一个：便于读者的阅读与了解，尽量减少阅读与了解的“拦路虎”。

因系经过抉择、加工之新编，故统以该作家之字、号，后赘“随笔”二字为各该册之书名。计划以每辑八册，分辑陆续编印。

尽管旨在为读者献上一套经过选择与加工的雅俗共赏、品位高尚的文史读物，立意正大，将事认真，但是否符合读者口味，特别是上述选粹原则与加工方法之是否有当，均有待于读者来审查与鉴定。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不惮风险，勇于组织编印这套效益尚未敢必的丛书，尤足征其识见与魄力。作为选编者的我们，更殷切期望得到方家与读者的批评、指正。

1997年溽暑，姜纬堂谨识于京华两知二有之斋，时年花甲有二。

许国英和他的随笔

姜纬堂

辛亥革命，推翻帝制。向来只准臣民歌颂“吾皇圣明”，稍涉讥评，便属“大不敬”的封建铁律，被彻底掀除。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皇家生活内幕，亦不再是严禁漏泄的高度机密，而变为引人兴趣的话题。这种可以无忌讳地畅论皇帝，以皇家为谈资的局面，标志着封建禁梏的初步解除，确实得来不易。

在这种政治社会背景下，因缘时会，便出现了一批讲述、描绘清朝佚事、秘闻的小说、戏曲和随笔。求其内容依据，则大多本诸民间之向所流传，而加以生发。其中固有态度严肃与荒唐无稽之别，但因其适应读者反思历史、好闻珍秘与喜知故事的不同需要，尽管被视为不登大雅，但却颇有市场。本书著者许国英，便是当时甚为著名的一位态度比较严肃的此类随笔、小说作家。

许国英(1875—1925年)，字志毅，号甦庵，别署子年、指严、不才、不才子、耕砚楼主、禅花洞主等，江苏省武进县(古称毗陵、今常州市)人。出身仕宦家庭，虽幼习举业，但逢废除科举，故未及获得功名。但因此而打下旧学

基础，擅长古文与书法，并养成时号为风雅的名士气。

清末，被聘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（今交通大学前身），继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，为该馆编纂中学国文、历史教科书。其间，参加了革命文化团体“南社”，为该社早期成员。辛亥革命后，任南京金陵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员。继往北京任财政部秘书。后因不惯宦途，辞归上海，以著述与卖字为生。终其一生，堪称才士，惟因多子女，生活负担沉重，致常处于艰难之中。晚境颇为潦倒，死后无以为殓。迫于生计因而笔耕甚勤，著述颇多，尤以娴于清代掌故，而为时所称。

许氏著述中，有一部分是他研究清代历史的成果，如《清史讲义》、《清鉴易知录》、《清史拾遗》等。其中，《清鉴易知录》二十八卷，近年尚一再重印，犹不失为了解清代史事的有用之书。与这类专门著述相较，则其兴趣所注和最为人称道者，实为其关于清代野史之纪述。其中，可以《南巡秘纪》和《十叶野闻》为代表。

《南巡秘纪》问世于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又出《南巡秘纪续编》，皆上海国华书局版。系以清高宗南巡为纲，纪述围绕这位“十全老人”六下江南，所展开的乾隆朝相关史事和朝野遗闻。《自序》称：“语或离奇怪诞”，但皆系“存之区区父老之唇舌，不绝如线”的历代相传。“盖时未沫，则口传较切也。然而单词只语，仅仅流传，不经通人硕士之润色，虽曰信史，谁其信之？”从知，作者仅是在民间秘传的基础上有所“润色”而已。

《十叶野闻》分上、下卷，初版于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，亦上海国华书局首印。纪述自顺治入关，以迄宣统逊位，凡十帝期间的朝野掌故。《自叙》称：“髫幼趋庭，即嗜故事；街谈巷议，敝帚自珍。”又谓：“荟萃十纪，综甄九流，网三百年之散失，蔚十万言之大观”，乃前所未有的。言下颇为自负。就当时言，实非夸诩。因仍属故老传闻之秘辛，故于书名《十叶野闻》上冠《清秘史》三小字。

此外，他还应市场之需要，编撰了多种关于民国初期史事的专书，如《复辟半月记》、《民国十年纪事本末》、《民国春秋演义》、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等。随笔著作，则可以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面世之《新华秘记》前、后编为代表。二书皆上海清华书局版。

《新华秘记》，以记阴谋家、野心家袁世凯，自清末发迹，以至窃国、称帝，终于在全国同声指斥中覆亡，及围绕于袁氏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主。因袁以中南海为大总统府，新辟门曰新华门（洪宪帝制时，改中南海为新华宫）而名。虽其于袁氏死后方至京，事非亲历，但得及时广泛搜集报刊与口碑资料，终为以时人述时事之佳作。

也正是为了迎合市场和迫于生计，许氏晚年还曾伪撰过一部《石达开日记》，由世界书局作为新发现之秘本出版。致劳学术界人士认真加以研究，辨其不实，断为伪作。在这场波澜中，得实惠者惟出版商，于许氏却未免有损令名。虽系穷急生疯之时代悲剧，究不足为训。

但从许氏之敢于承担伪撰之任，也足以说明其对当

时史事之了解与掌握，实具相当造诣，算得上成竹在胸。伪书之必被揭穿，一是由于伪托者毕竟非亲经实历，故往往在不经意处露出破绽；二是向来之专门作伪者，例皆有意留下一点纰漏，以示明眼人。许氏之是否遵守传统旧例，固无从知，但从他肯将作伪实情明告友人（郑逸梅：《艺海一勺》所收《伪作的〈石达开日记〉》）推测，似当属有意留点纰漏一类。

除专著与随笔外，许氏早年还是一位文言小说作家。《小说月报》初期，多有其作品，有些还曾出版单行本，今尚有存者。内容基本属于言情一派。兹不具述。

本书作为许氏文史随笔作品的选集，取材自《南巡秘纪》（包括《续编》）、《十叶野闻》（上、下卷）和《新华秘记》（前、后编），皆据原版或再版本。其中，《南巡秘纪》皆用原标题；《十叶野闻》原以一题赘“×则”标目，今皆分则重拟标题，亦不考虑其原包括则数之多少，或原系五则而均取，或原有九则而仅取其三；《新华秘记》则基本用原标题，个别过“文”，含义为今人所不易明者，则予新拟。全书径以原书名括注“选”字为别，不另统合，再为分类。

所选，虽仅一裔，但不难从知许氏随笔之两大特点。

其一曰“秘”。

除本书取材之三书，其名皆冠“秘”字外，许氏尚有《天京秘录》、《三海秘志》。可见这“秘”字之与许氏缘分非常。其间，固不免含有迎合“探秘”心理之噱头，具广告效应，但究其内容之实际，则亦未尽为吹嘘。其所记，确

有相当一部分，非世所熟知，人所经闻。今日尚然，退回到民国初年，更是如此。因而，称得上这个“秘”字。

当然，“秘”之能为人所知者，往往未必尽真。惟其讳莫如深，迷离倘恍，人所欲知而不能知，或不尽知，遂成为“秘”。许氏所记种种，既系揭密，则其所揭，亦只能视为其来有自，事非无因，无风不起浪。纵未尽合当时之真，但却折射出传述者、揭密者之真，反映了那个时代，对于该“秘”之认识与态度。这其实也是一种可贵的史料。何况“未必尽真”，并非都不真。舍去未真者，自然具有独特价值。其引人兴趣者，亦正在此。

其二曰“活”。

此谓活灵活现活拨生动之“活”。所记种种，作者既未曾参与其间，亦非身经实历，则人物之种种秘室策划，私房对话，乃至心理活动，皆栩栩如生，描绘尽致，非传述者乃至许氏之加工而何？此即传统讲故事之手法。非此，无从交待来龙去脉，亦难得逗起波澜，引人入胜。其实，早自太史公司马迁即运用此法，惜后世史家不肖，才把历史著作搞成千巴巴，令人乏味的样子。

事未必尽然，理则所当有。本质不虚，某些具体情节，容许加以想像与推测。惟如此，方能摇曳多姿，曲折生动，而收故事性强之效。就此而言，许氏此种写法，不仅未可厚非，且构成其特色。

然而，因这“秘”、“活”，也导致了不足。简单说有三：一是受时代思潮影响，反清的民族主义倾向，时有

流露：

二是由于来源不同，致于同人、同事，或前、后说法不一；

三是所述某些具体情节，与史实不符。如《南巡秘纪》之《伪皇孙案》篇，称刘文正公与和珅同为军机大臣，意见相左。实则，刘统勋（谥文正）逝于乾隆三十八年，和珅至乾隆四十一年方入直军机，而伪皇孙案则发生于乾隆五十五年。又如《十叶野闻》之《肃顺案异闻》篇谓肃顺欲推载垣为帝，此则纯出附会。设果如此，则当年罗织肃顺罪名时，岂会漏此弥天大罪而不举？又称“荣禄以兵队至”，使肃顺“不敢动”。实则统兵者为胜保，如此重任当时尚轮不上荣禄。又如《新华秘记》之《皇侄》篇称：“及修正阳门楼，皆由小袁一手经理。”实则系朱启鈐“一手经理”，与袁乃宽无涉。似此之类，不及一一列举。因其最易以讹传讹，导致纷乱，故读者取其所述之主体，可也。涉及某些具体情节，则须经确核，方足征信。

作为近世文史随笔中的一个流派，许氏之善于摹绘，文笔流畅，足为个中翹楚。上述不足，则为民间传说所天然具有。要在其可与正史相印证，或补正史之不足。而这种姑可称作“历史报告文学”的写法，亦未必没有可供参照之处。百花齐放，不拘一格。本辑之列许氏为一家，以此。未悉读者以为然否？